

# 二十世紀漢語界的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綜述

陳開華

## 引言

從利瑪竇神父開始的對華傳播福音工作，繼之而來的傳教士們在方法上，大都遵循了由「偉大的利瑪竇神父」開創的學術傳教方針。所以就實存意義上言之，明清間隨著天主教的東傳入華，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出現多元互補上的交流，由此開創的「西學東漸」與「漢學西被」，及後成了二十世紀學界的一個大議題。人們在不斷地討論，到底西方傳教士給中國帶來的是什麼？而他們又將中國的

什麼介紹給了西方世界？簡言之，對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就成爲二十世紀學術界的一個熱點話題，正如由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先生於一九七九年在美國創辦的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中西文化交流雜誌》）用中文表述名之爲「中國天主教史研究」具有經典意義一樣，對明清間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就被寬泛地定義爲是對「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

回顧二十世紀漢語學界在中國天主教史方面的研究，在學界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已經有學者做

了這個工作，但在教內卻鮮有人問津。我們將根據現有的一些資料和個人的研究，從「教內人」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闡述。在方法上，將把教內與教外分開論述；根據地域，將台灣的情況與大陸的成果分開。

##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天主教史研究

### (一) 教內

對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由於在語言、史料的掌握方面的優勢和對研究教會歷史的現實需要，最先是從教會開始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研究大都是由通史開始。

最早對中國天主教史進行史料研究的是，十九世紀末葉的華籍耶穌會士黃伯祿神父，他的《正教奉褒》與《正教奉傳》既有護教學上的立論，又是異常珍貴的原始文獻。前者以天主教傳華史為主線，從景教來華至道光六年（1862），以原始文獻為史事，形式上涉及了：史實、奏疏、碑文、上諭、

欽賜匾額、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們的詩文唱和等。後者中作者自謂：「茲將所及見聞之朝廷恩旨及中外大臣奏疏示諭并道府州縣告示匯輯一卷，緣之曰《正教奉傳》，爰述天主教傳入中國之原委，弁之簡端云。」<sup>(1)</sup> 列有晚清各地地方官府針對天主教發布的告示，是研究清末教會情況的極佳文獻。

通史方面有兩部華籍耶穌會神父的著作：一為蕭靜山司鐸的《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獻縣天主堂，1937），該書錄自作者的另一著作《聖教史略》唯對「前五、六卷所述史事……據中外各史，覆加考窮，多所增入，間且有改正處。」<sup>(2)</sup> 書中為數不少的原始文獻使這一本研究中國天主教史的早期著作就有了相當的學術底蘊。另一部是廣為人稱道的徐宗澤神父的《中國天主教史概論》（上海聖教誌社，1938），作者將發表於他主編的《聖教雜誌》中的論文整理成一本通史，作者因有歐美留學之基礎與執掌徐家匯藏書樓之方便，故能輕車駕熟地廣泛運作中西文史料，使該書在文獻與史料的運

用上獨具一格。

在民國時期的天主教，徐宗澤神父是一位多產的學者，著作涉及神學、哲學、教史、目錄文獻等方面。徐氏的《明清間耶穌會譯著提要》一書，是作者對徐家匯藏書樓中所藏明清耶穌會士和中國公教學者們的著述在目錄文獻學方面的研究，舉書凡二百一十五部，仿四庫全書體例分類為七，從內容提要、版本、出版時間、序跋等方面著手研究，這是唯一一本中國天主教文獻目錄學專著。徐神父的另一貢獻是，他將徐允希神父刊行的《增訂徐文定公集》進行了校訂、重刊。

在對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中影響深遠的當推陳垣先生，陳氏因其成就廣博，在學界是公認的「大師」。陳垣自一九一九寫了《元也里可溫考》之後，對歷史學與宗教史學的研究便一發不可收，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自不待言。在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方面，他不同於前面諸位之處在於，他運用散見於詩文別集、書畫題跋中零星史料來研究天主教。他

提出，運用教外典籍來研究天主教，補教史之不足、正教史之偶誤、可與教史相參証、從反對口中可得反証等主張。對吳漁山的研究至今無有出其右者。由其門人葉德祿於一九四三年整理出版的《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叢》，收陳氏論文十六篇，「此或為民國成立以來的前三十年間，個別中國學者在天主教傳華史領域上整體水準的最高的研究成果」。<sup>(三)</sup>其中「從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涇陽王征傳」、「休寧金聲傳」、「湯若望與木陳忞」、「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綜合展示了其人在詩文別集、書畫題跋中爬梳的獨特功夫。據筆者統計，他的天主教史方面的論文大約為數三十三篇之多，散見於各種文集中。陳氏在中國天主教史料、文獻的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貢獻，即對典籍、文獻的校刊，經他校刊的明、清典籍共有六部。

我們將他置入教內來討論的原因有二。首先，他的論文是從教內的立足點來研究中國天主教史，方豪嘗謂其文：「考古彌精，崇論彌闕，洵足光輝

基督，推倒陋儒」<sup>(四)</sup>；其次，陳氏爲新教教徒，在方豪與他的通信中我們們可以知道，在一九三六年時，陳氏意欲入教，<sup>(五)</sup>但或因置有妾的原因，<sup>(六)</sup>終未成。我們無意將他硬性地納入教內來討論，但根據台灣學者黃一農先生的意見，陳氏也如同公教學者們一樣，在他的論文中充滿了「揚教心態」。<sup>(七)</sup>爲此，由陳垣將尋出一位在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上卓爾不凡的人物——方豪神父。

據方豪自己說，他還在杭州修道院念書時，即私自突破院禁，與當時教內宿學馬相伯、英斂之等通信請教教史問題，而與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先生通信論學，則延續了二十餘年，成爲史壇一段傳頌至今的佳話。方豪自謂爲陳垣先生的「私淑弟子」。在對中國天主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面，由於語言、環境諸多方面的便利，方氏實有「勝於藍」的成就。在大陸時，方豪神父即已是名滿學界，與當時學界交通往來，在教內無出其右者。研究所及：浙江天主教史、李之藻、徐光啓、中西交

通史、中國天主教史，計開著述兩部、文集三部，另編馬相伯文集二部。<sup>(八)</sup>其中以由胡適先生題簽的《方豪文錄》成就最高。方氏的成就，遠不只這些，隨後花開台島，獨領風騷。方氏爲文言簡意賅，出皆有據，游刃於中、外史料之間。陳垣先生曾贊揚說：「公教論文，學人久不置目，足下孤軍深入，一鳴驚人，天學中興，捨君莫屬矣！」<sup>(九)</sup>

在譯著方面，有幾部成書於中國本土的，需要在這裏介紹一二。一爲法籍耶穌會神父費賴之的《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95；梅乖騏譯，上海光啓社，1997），費氏在江南傳教二十餘年，該書是作者傾一生心力之作，研述了一七七二年前在華傳教的四百餘位耶穌會士的傳記和書目，廣泛地引用了西文史料，隨後有榮振華神父（亦爲近代入華耶穌會士）編了《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耿升譯，中華書局，1995）對其進行了細緻的補充。另一位在中國本土以運用中西文研究中國天主教史的成就非凡

的也是一位耶穌會的神父——裴化行。他有兩部著作被譯成了中文，一為《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蕭睿華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一為《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王昌社譯，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6），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商務印書館，1993，後更名《利瑪竇神父傳》。一八四二年以後，在上海傳教的新耶穌會士史式徽神父的作品《江南傳教史》（上海天主教史料編寫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一書，成了人們認識近代天主教在江南教區所開展的傳教工作、文化傳播、社會服務等方面詳實而可信的論著。

通史方面有兩部。一為，北京教區主教樊國梁留下來的三卷本《燕京開教略》（北京救世堂，1905）根據樊氏的說法「中國聖教鑿史之記，雖雜見於聖教諸書，然而專治之家至今尚無其人，夫以中國奉教之人而昧於中國聖教之史，此誠一大憾事也。」所以，該書率先對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做了一個世紀性的開創工作，這本書是對作者法文著作

《北京考略》一書的節譯。<sup>(十)</sup>上屹於傳說中的多默宗徒傳教印度隨後又傳於中國之說，下止於光緒朝多默來華之說，言之鑿鑿，但這種附會之說，時至今日已沒人採信。該書行文簡約，通俗易明。附有圖若干幅，據陳垣考証，人像、圖片取自《晚笑堂畫傳》、《芥子園畫傳》、《明太祖功臣圖》、《三國演義》諸書，張冠李戴，牽強穿鑿。<sup>(十一)</sup>第二部是德禮賢神父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蕭華譯，商務印書館 1936），止於一九三三年，對二十世紀的天主教作者花了近半的篇幅進行論述，為我們今天研究清末民初的天主教情況，提供了基本的材料和數據。以上述諸位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對原始書信、檔案的研究、分析上，故成就相當高，至今猶為學界引用不絕。

新教方面王治心先生的通史著作《中國基督教史綱》，對中國天主教的研究亦有相當的篇幅，為學界所矚目。

整個民國時期，教會在研究、出版書籍方面

作了許多的工作，據一九三八年統計，「天主教在華設有二十六處出版所，發行一百一十五種的定期刊物。」<sup>(十一)</sup> 教會在對中國教會史料、文獻的出版上，亦做出了令人稱道的貢獻，上海土山灣印書館重刊了為數不少的明清兩朝教會的書籍。利瑪竇及其他的傳教士和著作在濟南、北京、重慶、澳門、香港等地重刊印行，這為人們研究明清時期的教會提供了便利。

## (二) 教外

二十世紀的上半葉，是名家迭出的世紀，「形成了宋以來學術發展的又一高峰，其原因是史料的大量發現，承襲清學餘蔭，溝通域外漢學，當在首要之列。」<sup>(十二)</sup> 隨著西域考古和敦煌文獻的發現，使中西文化交流這個領域，成爲一個熱門話題。對明清之際天主教傳華過程中的溝通中西文化的活動，成了許多學者研究的對象。

對於明清耶穌會士與中西文化交流，梁啓超是這樣評價的：「明末有一大公案，爲中國學術史

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曆算學之輸入。」是傳教士的參予，完成了晚明曆法的改革。「此外中外學者合譯或分撰的書籍，不下百數十種，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譯之《幾何原本》，字字精玉，爲千古不朽之作，無用我再讚嘆了。其他《天學初函》、《崇禎曆書》中幾十部書，都是我國曆算界很豐富的遺產。又《辨學》一編，爲西洋論理學輸入之鼻祖。又徐光啓之《農政全書》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實農學界空前之著作。……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爲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影響不小。」<sup>(十四)</sup>

在文獻研究方面有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輔仁大學，1930）四巨冊，唯其中第三冊涉及中國天主教史料尤多。其它如：向達、馮承鈞、洪業、張維華、陳受頤、朱謙之、陳觀勝、嚴敦杰、歐陽琛、李儷、范適、<sup>(十五)</sup> 閻宗臨<sup>(十六)</sup> 等都致力於

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對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開創了一時的繁榮局面。他們留下來的著述，為我們今天的學界都還是津津樂道的權威，經常見諸學者們的文中頁末。

其中獨闢蹊徑者當推朱謙之先生，他的《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在建國後，作者對書中的一些觀點與資料進行了修正與補充，更名為《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一書中，從「漢學西被」的角度來講中西文化之間的交流，傳教士在將「西學東傳」的同時，也將東方的文明、中國哲學介紹到了西方，引發了歐洲的「中國熱」，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西方在近代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惠於中國文化。朱氏的這一史識，到今天仍是一個尚待深究的課題。朱氏的另一著作《中國景教》（東方出版社，1993）亦是至今無人能超越的名著。

##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

這時期，在對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上教內沒

有什麼建樹，在學術界也是成績平平，具體而論，在四個方面些許成果：

（一）、對徐光啓的研究。由於科學在建國後的建設中得到重視，對徐光啓這位近代科學家《農政全書》的作者，進行了科學成果方面的研究。據統計，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間，有近四十篇論文發表於各類刊物上，其中密集於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在各種刊物上以表的論文即有廿四篇之多。<sup>（十七）</sup>王重民先生編校的《徐光啓集》（中華書局，1963）對徐氏在教會方面的十餘篇著述以「多屬偽托」為由，只收了《辯學遺牘》一文。徐懋禧編有《徐光啓先生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編有《徐光啓紀念論言論集》（1963）等。

（二）、對教案史的研究。這時期的著作有《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李時岳著，人民出版社，1958）、《反洋教運動》（李時岳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天津教案》（南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62）。

社，1962）等。

（三）、從明、清傳教士的著作中來研究中俄關係。由於一九六九年中俄珍寶島事件，致使不少的學者撰文著書從明、清耶穌會士參予了中俄尼布楚條約來進行研究工作。這時期的譯作有：《耶穌會士徐日升關於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的日記》（王立人譯，商務印書館，1973）、《張誠日記》（陳霞飛譯，商務印書館，1973）等。

（四）、對明、清耶穌會士傳入中國的評價問題。這方面的代表作當舉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一書，第四卷二十七章題名為「明末天主教輸入什麼西學？具有什麼歷史意義？」該文運用了大量的史料、明清耶穌會士的作品、明清時僧俗兩界對天主教的非難，從「神學經院哲學的輸入及歷史意義、天主教義和中國傳統思想的論爭、天主教輸入中國的自然哲學和思想方法、從技術科學看耶穌會所輸入的西學」四個方面進行研究。作者的觀點有其鮮明的時代特

徵，該文認為耶穌會士所輸入的哲學、科學技術等都是西方已過時、落後的東西，對中國科學的成長沒有多少意義。

## 一九七八年以後的中國天主教史研究

### （一）教內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宗教界得以進行重建工作。天主教的工作主要體現在教產的落實、教會的重建、神職人員的培育等方面，在學術上建設幾乎為零。在八十年代中期，任教於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的郭慕天神父編寫過一部《中國天主教史綱》（二冊）作者引用資料極豐，只可惜該書沒有出版，只是油印了供神學院的修士作教材用。湖北蒲圻教區的王書楷神父在一九九二年出版了一本題名為《天主教早期傳入中國史話》的書，該書據《利瑪竇中國札記》寫成，通俗易懂，頗受廣大教友歡迎。在個案研究上唯有河北神學院的張澤神父著有一本《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台灣：光版出版社，



1992)，有一定的學術品味。

至於論文，則散見於為數甚少的幾個期刊之中，如《中國天主教》（北京）、《天主教研究資料匯編》（上海）、《信德報》（河北）。一批活躍的作者懷著對信仰的熱愛、對整個中國教會負責的熱情，在地方教會史的研究上有一些可喜的成果。

一九八九年五月上海教區舉辦過一次「徐光啓學術研究會」，這是教會內自八十年代以來唯一的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會議。參加是次會議的不但有教內的學人，亦有教外的知名學者，從論文內容來分析，與會者從徐光啓的信仰歷程、神學思想、科學貢獻、文物保護、文獻整理等方面的認真研究，使這次會議有了相當高的學術品位。參加是次活動的教外學者今天大多還活躍在研究天主教的學術領域。會議的論文收入上海教區光啓社出版的《天主教研究資料匯編》第十五、十六輯（季刊，1989年9、12月刊）中，計開十六篇。

出版方面，河北信德室出版了一本七十年代

台灣華明書局翻譯、出版的《中國教理講授史》（燕鼎思著，田永正譯，河北信德室，1999）該書寫於本世紀四十年代，從「教理講授」這個獨特的視角開始研究工作，如同許多著名的漢學家一樣，作者廣泛的運用原始文獻，使該書的學術品位顯得是那麼的無與倫比，至為可惜的是出版者只列出了注解符，而缺省了尾注，使讀者没法就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探究，這亦充分顯露了教會在學術上的缺失。

## （二）教外

八、九十年代，世界漢學界對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召開過幾個關於中國天主教史研究的國際學術會議：「衛匡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意大利，1981）、「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1983）、「柏應理國際學術討論會」（比利時，1986）、「南懷仁逝世二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台灣，1987）、「南懷仁國際學術研究會」（比利時，1988）、「紀念湯若望四百周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國際學

術研究會」(台灣, 1992)、「湯若望國際學術討論會」(德國, 1992)、「中國禮儀之爭國際學術研討會」(美國, 1992)、「尚蒂伊國際漢學研討會」(法國, 由1974年起, 每二年召開一次)、「Europe and China」會議(由謝和耐與許理和發起, 自一九九一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討論十六、十七世紀中、歐關係史)等, 使國內有幸參加的學者們在資訊、動態、成果方面與國際上的研究水平有了一個交流的機會, 這對國內史學的成长無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國內相應地開了幾次不同規模的國際研討會, 如: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究會」(上海, 1993)「衛匡國與中西文代交流先驅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 1994)、「基督教文化與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 1994)「1550—1840 中西文化交流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 1998)等, 是對國內學界研究水平的整體檢閱, 促進了學者們之間的交流、切磋。值得一提的是, 每一次會議幾乎都有大陸教內的人參加, 但影響甚渺, 在對中國天主

教史的研究上不及學界甚遠。

一些漢學家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 亦促成了國內學界向世界開放的機會, 提供了交流的契機。著名而經典的有早期的: 史式微、費賴之、伯希和等; 當代的大家有: 榮振華、艾田薄、謝和耐等; 神職界的漢學家有: 沙百里、柯毅霖等。<sup>(十八)</sup> 被

譯成中文的兩位著名漢學家的著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研究範式: 一為謝和耐的《中國和基督教》(耿升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于碩等譯《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衝突》,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9); 一為鍾鳴日的《楊廷筠: 明末天主教儒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翻譯、出版, 1988), 這兩部被許理和先生稱之為「兩個里程碑」<sup>(十九)</sup> 的著作, 標誌著西方漢學界的研究範式由「西方中心論」轉變為以中國為中心, 學者們以為這是漢語學界在研究範式上應當借鑒的。<sup>(廿)</sup>

孟德衛 (David E. Mungello) 先生於一九七九年在美國創辦的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中文刊名《中國天主教史研究》不但兼收並蓄對英、法、德、意諸文種開放，亦時有中國學者的作品見諸編中，這說明國內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亦有其「國際價值」。

國內的背景情況則是，在許多大學裏近幾年成立了關於基督宗教的研究機構。如：上海科學院宗教研究所（1980）、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1991）、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1992）、福建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1994）、北京大學宗教學系基督教研究室（1995）、上海教育學院文化研究中心（1995）、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1996）、復旦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1996）、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1998）、山東大學宗教研究所（1998）、陝西師範大學基督宗教文化研究所（1998）、中山大學文學宗教研究（成立時間不詳）等，促成了一大批學者有組織、有規模地在基督教（廣義）的領域

深入地進行研究，也促進了一些非學術團體的學者們的進展。總之，八、九十年代，就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方面，學界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果。□

## 註釋：

- (一) 黃伯祿《正教奉傳》序，上海慈母堂，1908年聚珍版。
- (二) 蕭司鐸：《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書首「注意」，獻縣天主堂，1937。
- (三) 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 (四) 王明澤：《陳垣事迹著作編年》，收入《紀念陳垣校長誕生 110 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 (五) 陳智超：《陳垣往來書信集》第 294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六) 謝扶雅：《陳垣受洗入教問題——五四時代自

由氣氛中的一個插曲》，載《傳記文學》(台) 第二十一卷第五期(1973)，第20-36頁。

(七) 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八) 《李我存研究》，杭州我存雜誌社，1937。《徐光啓》，重慶勝利出版社，1944。《中外文化交流史論叢》第一輯，重慶獨立出版社，1942。《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甲集，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上智編譯館，1942。《馬相伯先生文集續編》，北平上智編輯館，1948。《方豪文錄》，北平上智編輯館，1948。

(九) 陳智超編：《陳垣往來書信集》第30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十) 樊國梁：《燕京開教略》「燕開教略序」，北京救世主堂，1905。

(十一) 陳垣：〈燕京開略畫象〉，天津《益世報》，民

國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十二) 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第282頁，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十三) 桑兵：《國學與漢學》緒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十四)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0-11頁，東方出版社，1996。

(十五) 上智編輯館：〈研究中國天主教史迹之教外學人〉文載《上智編輯館館刊》1946年1卷。

(十六) 閻守誠編：《閻宗臨史學論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十七) 邊曉麗等編：〈中國基督教史論文索引〉(1949-1997年)見卓新平、許志偉主編《基督宗教研究》第一輯，第387-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十八) 《聖教入川記》(法)古洛東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江南傳教史》，(法)史式微著，

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編寫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衝突》（法）謝和耐著，于碩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耿升譯名《中國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法）衛青心著，黃慶華譯，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的接觸》（英）利奇溫著，朱杰勤譯，商務印書館，1991；《利瑪竇傳》（美）喬納森·斯彭斯著，王改華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孫尚揚、王麗麗譯本名《利瑪竇的記憶之宮》，台灣輔仁大學出版社，1991）；《中國之歐洲》（法）艾田蒲著，許鈞、錢林森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蒙古與教庭》（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94；《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國基督教》（英）穆爾普，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95；《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法）費賴之

著，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95（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上海：光啓社，1997）；《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法）榮振華著，耿升譯，中華書局，1995；《歐洲與中國》（英）赫德遜著，王遵仲等譯，中華書局，1995；《華樂西傳法蘭西》（法）陳香梅著，耿升譯，商務印書館，1998；《萊布尼茲和儒學》（美）孟德衛著，張學智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中國基督教徒史》（法）沙百里著，耿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晚明基督論》（意）柯毅霖著，王志成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等。

（十九）許里和著，辛岩譯，〈十七——十八世紀耶穌會研究〉載《國際漢學》第四輯，大象出版社，1999。

（廿）張西平：〈關於明末清初天主教史研究的幾點意見〉。